

哲学研究及探索

对历史的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如何可能?^{*}

——胡塞尔对几何学和近代物理学意义起源的现象学沉思

张昌盛

【提 要】通过对几何学和近代物理学的意义起源的追问,胡塞尔进而对人类历史作现象学研究是否可能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以对几何学的意义起源的追问为例证,胡塞尔论证了我们可以对几何学和整个人类历史作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使科学真正奠基作为我们的历史视域的生活世界。把现象学的研究由静态拓展到历史性的、发生学研究,是实现现象学为科学和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奠基的必要前提。甚至可以说,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以往现象学的非历史性的静态结构研究、逻辑研究的补充,而是一种更为彻底和根本的现象学研究的途径。

【关键词】胡塞尔 几何学 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51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09) 06—0020—10

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胡塞尔认为只有通过超越论现象学的彻底反思,使科学重新回归生活世界,欧洲科学的危机才能真正克服。无论是近代以来的客观科学以及相关的客观主义,还是我们人类的整个精神生活,都是作为人类的唯一的历史性视域中的构成物。因此,作为一种彻底的哲学反思,现象学对我们的科学和文化的探究应该深入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的发生构造过程中去。

那么现象学的考察如何才能真正深入到人类的历史性之中呢?胡塞尔在《论几何学的起源》^①(以下简称《起源》)中,以对几何学的源初意义的历史构成的考察为范例,论证了对科

学和整个人类历史进行现象学的历史发生学研究的可能性。通过《危机》中对几何学意义之起源问题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伽利略的新物理学意义之起源的揭示,“一道光芒闪耀在我们全部的事业之上,想以历史沉思的形式实现对我们自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现象学视野中的科学——一种对自然主义的超越”(项目编号09CZX014)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课题“现象学视野中的科学”的阶段性生活成果。

① 本文中所引的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文本见《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附录部分。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220页。

身的当下的哲学状况的思义，并希望我们因此而最终能够获得哲学的意义、方法和开端”。^①也就是说，胡塞尔认为这里对几何学和物理学意义起源问题的揭示开辟了一种对思想和文化进行现象学的历史发生学研究的路径。

虽然胡塞尔的切入点是几何学的意义起源问题，但他认为，“我们的考察必然会导致最深刻的含义问题、科学问题和科学史一般的问题，甚至最后会导向世界史一般的问题；因此，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关于伽利略的几何学的说明便获得了一种例证性的意义。”^②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不仅提出了一种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科学作现象学研究的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而且提出了作为一门关于人类历史的本质一般的现象学研究是否可能的问题。如果这种研究可行，则可以实现对现象学精神在整个人类文化和历史领域的彻底的、最终的贯彻。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思考胡塞尔对近代以来数学的转化和伽利略的新物理学的源初意义的构成的考察，正是这个考察揭示了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我们依据胡塞尔在《起源》中的洞察，论证对几何学的源初意义的历史发生构成的现象学考察的可能性。最后，我们要探讨是否可以把对几何学源初意义构成的论证推广到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现象学考察。

一、胡塞尔对几何学和近代物理学的源初意义构成的考察

对关于几何学的理念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伽利略以来数学的自然化的批判，本来是为了揭示近代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如何造成了当代科学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但胡塞尔却发现几何学和伽利略物理学的历史是一种在伽利略的揭示真理的动机牵引下的意义的构成史。

（一）几何学的理念化和纯粹数学的产生（几何的历史发生构成）

胡塞尔认为，早在古希腊时期，几何学就已经开始理念化了。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几何学已经摆脱了那种经验性的研究方式，而采

用系统化的演绎方式来统一地证明几何定理。这种理论从基本的定义和公理出发，按照必然性的推导展开，从而得到全部合理的定律的整体。这种真理性的体系整体中的所有定律都是可以直接被地或者间接地洞察的。

但古希腊数学和逻辑学都只具有一种有限的、封闭性的先验性，而近代以来的数学科学却是一种无限的系统的先验性，一种无限的、却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理念的体系。以几何学为例，这种新的几何学以基本的概念和公理为出发点，可以演绎地构成该对象区域内的所有的空间图形，“凡是在几何空间中理念地‘存在’的东西，预先就在它们的全部规定中一义地决定了”。^③这种关于无限的“存在”的整体的思想以及一种系统地把握这种存在整体的科学的理念的构想，完全超出了古希腊以来的有限性的思维方式。人们不再满足于单个地、不完整地、好像是偶然地去认识几何学的理念世界中的对象，而是要以一种合理性的系统的方法来统一地把握这个理念世界整体。尽管可能无法在一次性的研究中把握，但是通过以这种系统化方法进行一种渐进的展开，最终能够把握整体区域中的每一个对象的客观的存在。

对于几何学的理念化构造，就历史的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接触到的是直观的生活世界中的物体的空间时间形式。一开始，无论我们在想象中怎么改变这些形状，它们始终不是几何学中的点、线、面、几何体。但是这些想象中的图像却可以获得不同等级程度的理想性。按照胡塞尔的质料本体论，直观世界中的一切对象都有其类型上的预先确定性，因此它们在任何变化中都保持着类型上的同一性和延续性。因此当在想象中对这些对象及其关系不断进行变形和精确化时，图形逐渐获得了渐进的完善性。这种理想化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思想的努力而不断地向前推进，可以预期一种完

①②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175、174~175页。

③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2页。

善化的极限形态。我们的一系列个别性的理念化的努力可以无限地逼近这些极限。如果我们以这种理念性的形态为研究的领域，就可以通过重新地规定它们而获得这些形态的普遍形式。这种纯粹的形态作为一起被理念化了的时空形式，是保持在纯粹的极限形态中的思想。这种几何学理念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自由想象的变更获得本质性的理念的过程。

具体地说，胡塞尔认为纯粹几何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前科学的直观世界中的测量实践和测量方法中去。他谈到，几何学的理念化是“以一些基本形态为基本规定手段，由此出发对一些理念形态，最后是对全部理念形态进行操作规定的几何学方法”。^① 这种测量涉及到一种综合性的工作，测量只是其最后一步。首先要为山川、河流和建筑等现存之物的形体创造出概念，即“首先要为它们的‘形状’（借助于图形的相似）创造出概念；然后为它们的量和量的关系创造出概念；另外还要为它们的位置规定创造出概念。”^② 这样，从比较具体的实用实践中的测量开始，逐渐扩展为新的形态的领域。“这种经验的测量技术以及它的经验的——实践的客观化功能，通过将实践的兴趣转变为纯理论的兴趣，就被理念化了，并且转变成纯粹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因此测量技术就成了最终是普遍的几何学和它的纯粹极限形态的‘世界’的开路先锋”。^③

这种理念对象作为意向性构成物，具有一种本质的规定性。如几何图形的规定性和诸组成部分之间的形式规定并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心理状态，而是具有主体间的普遍客观性。三角形的性质并不依赖于任何的语言和思考者的心理状态，也不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有所改变；数学定律只依赖于数学范畴规定的对象领域的整体特性，而不涉及现实世界的任何特性。

近代以来，通过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并在主体间共同运用的理念化和构成的方法，这些极限形态就变成习惯性地运用的观念物。借助于它们，尤其是通过形式化和抽象化，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无限的、然而却自身封闭的理念对象的世界。

（二）伽利略的数学化自然的设想（自然科学的历史发生构成）

在胡塞尔看来，自然的数学化和数学—物理学的建立，是以纯数学的产生和反过来“下降”为应用数学为前提的。因此，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探讨如何由几何学在规定直观世界对象的形态的成功，导致伽利略认为我们可以采用一种类似的方式而把整个直观自然的各个方面都自然化，以数学—物理学获得对整个自然界的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能客观地规定这样的理念的。

到了伽利略生活的时代，纯粹几何学已经反过来成为应用技术，用于系统地构造，用于客观规定诸形态的测量方法学。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克服主观把握的相对性，获得一种对直观世界中的各种形态的本质性的真理，凡是能应用这种方法的人都会得出这些真理。这种认识并不是从经验进行的简单归纳，而是以几何学的理想形态作为引导性的极标，从经验上给予的东西出发，不断上升，向几何学的理想形态逼近。

纯粹数学在形态的领域内的实践的不断成功，促使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把这种认识直观世界的形态的方法推广到认识自然界是否也可行？

但是，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种纯数学的应用中，作为极限形态数学的理念只和空间时间中的抽象形态发生关系，而且是把这些抽象形态看作“理想的”极限形态与之发生关联。对于现实的对象来说，这种形式性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感性直观经验呈现给我们的质料性内容：颜色、声音、气味等感性的性质。因此，把数学全面应用到自然对象上，建立一种数学的物理学是否可能的问题摆到了伽利略的面前。

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察当时人们对直观世界的总体看法。虽然感性直观的世界中，一切对象在时间空间、在形式特征和内容充实

①②③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 39、39、39 页。

特征上总处于变化之中，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纯粹偶然的。人们认为，“通过一种普遍的因果规则，这个世界中所有一起存在的东西都具有一种普遍的直接或间接的紧密联系，由于这种紧密联系，世界不仅是一个全体，而且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是一个整体（尽管是无限的整体）”。^① 尽管那些具体的填充物体世界的空间时间形态要素的质料充实——特殊的感性性质——不能像时空形态那样直接地被探讨，但它们必须被认为是“客观的”世界的表现；在所有主观理解的各种变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把我们大家都连接起来的这同一个世界的统一的客观性和自在实在性。因此，在原则上，对直观世界的所有方面的客观化是可能的。

那么，如何才能像几何学应用于形态的理想极限那样，“从哲学上”严格科学地认识这个世界？根据与纯数学的应用相类比，“只当能发明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从当时在直接经验中只是相对查明的贫乏的储备出发，系统地，在某种程度上是预先地构造这个世界和它的因果性的无限系列，并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构造，尽管它具有无限性”。^②

既然这些世界的非形态的方面无法直接地数学化，那么只能采取一种间接地数学化的途径，以使其获得“真正的”客观性。这就意味着，可直观物的特殊感性性质（“内容充实”）和本质上属于它们的形态，可以以一种完全特殊的方式按一定规则紧密联系着。如果变动不居的直观世界具有一种一般的不变的存在样式，那么它的这两个方面必须是被预先规定的：首先，包含着所有物体的形态的空间时间形式，以及先验地属于空间时间形式的东西；其次，事实的形态和内容充实之间必须存在一种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同时，必须规定具体事物的抽象可分的各个方面被一种普遍的因果性联系起来。这也就是说，“物体世界的整个形态不仅一般地要求一个贯穿到一切形态的内容充实方面，而且要求，每一种变化，不管它设计的是形态要素还是内容充实的要素，都是按照某种因果性——不论是直接的因果性还是间接的因果性，但正是引起这种变化的因果性——

发生的”。^③

也就是说，“每一种通过每一种感性性质表明自己为实在的东西，在形态领域——当然总是被认为已经理念化了——的事件中肯定有其数学的指数，由此间接地数学化的可能性也必然在充分的意义上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必须能够借此（虽然是间接地，并且是以特殊的归纳方法）由所与构成、并且因此客观地规定内容充实方面的全部事件。整个无限的自然，作为受因果性支配的具体的宇宙……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应用数学”。^④

伽利略相信，物理学几乎就和纯数学及应用数学一样可靠，并且物理学也能为他预先规定出现实的方法上的程序。他需要依据物理学和数学的理念，构造出不断强化的测量方法，可以用来测量诸如速度、加速度等量。中心的任务是借助于这种数学化的工具，系统地把握这个假说所假定的经验世界的普遍因果联系。这里，数学的理念化和物理的理念化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精确的普遍因果性，全部事实的形态和内容充实都包含在这种理念性的无限性的因果性中。

伽利略可以确信，在直观物的内容充实方面也可以像形态领域那样，通过对每一种具体的事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是对它们的内容充实和形态发生因果关系的方式进行研究，有步骤地达到真正客观化的规定。那么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能够从这些所与中按照测量方法逐渐地揭示出隐藏的因果性的无限领域。像纯粹几何学一样，伽利略所需要的对直观所与的测量一开始虽然是与个别的事物打交道，但目的却是获得关于直观所与中的客观的因果性规定性，这些具体的内容充实的个别事物，都是直观自然的具体的总体类型中的事例。伽利略通过数学公式实现了对世界的有步骤的间接数学化。这些公式以数的函数关系表达一般的因果关系。因此，这些公式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纯粹的数与数的关联，而是“具有高度复杂意

①②③④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43、44、48~49、50页。

义内容的普遍物理学的理念”^①。

这种用数学公式表述的自然界的普遍因果联系，是物理学的一种决定性的总体性成就，任何人都可以按照逻辑上无可质疑的方法对它进行论证。借助于这种函数表达式，人们可以制定一种能进行预测未来直观现象的经验性规则。因此，自然的数学化及其获得的公式是对我们的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成就。

胡塞尔认为，尽管这种理论具有经验性的普遍性，但它永远是假说；尽管我们可以以严格的客观化方法论证它，但这种论证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先验存在方式。

虽然伽利略以来的数学—自然科学的抽象化使得它逐渐远离了直观的生活世界，遗忘了其源初的意义根源，但这种抽象的构造中仍然蕴涵着其源初的意义的构成、不断地沉积的连续的意义传承。借助于现象学的对科学史的历史性的回溯性追问，可以揭示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源初的意义构成。胡塞尔认为，这种现象学的发生学追问，可以适用于现象学对整个人类历史探究，其中对几何学的源初意义构成的回溯性追问可以作为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的例证。

二、现象学对几何学源初意义构成的历史发生学研究如何可能？

在通常的观念中，几何学则往往被看作超越于时间的普遍性真理，而历史和文化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在《起源》中，胡塞尔却把几何学看作是人类历史文化传统的典范，而不是特例。不仅如此，胡塞尔在此还要对几何学作历史性的考察。

几何学是典型的观念之物，因此特别适合作为整个历史文化的“例证”而作现象学的历史性考察。例如，胡塞尔在谈到几何学的客观性问题时指出，“这里涉及的是‘观念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为文化世界整个类别的精神产物所固有，属于这类精神产物的不仅有科学的构成物以及科学本身，而且也包括例如文学作品这种构成物”^②。如果几何学是人类文化的

范例，那么考察几何学的历史发生的现象学方法论，也会普遍适用于对整个历史性文化的考察。

胡塞尔之所以认为几何学、科学和其它历史文化同质并可以被现象学作历史性一般的考察，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事实的历史文化都以一种先天的本质结构或者历史一般为其根据的，因此，历史文化整体有一种本真的内在的历史。就此而言，几何学和其它样式的历史文化都是同质的。对文化的历史性考察，并不是去探究历史中的事实性的东西，而是要揭示这种所有文化都内在具有的历史一般或者历史的本质结构。

对我们而言，几何学是不是人类文化的“例证”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首要的问题是揭示对几何学及科学的历史起源的现象学考察如何可能，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对整个历史文化的历史发生的现象学考察以及一种内在的历史先天是否可能的问题。

（一）对几何学的历史起源进行现象学研究如何可能？

在《起源》中，“我们所关注的应该是回溯地追问最源初的意义，几何学正是根据这种意义才在某一天诞生。（并且）从那以后始终作为数千年的传统而存在”^③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即使现象学对几何学起源的历史回溯并不关注作为历史事实的几何学起源，而是要揭示几何学的源初的意义根源，那么这种对几何学源初意义的揭示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几何学（以及它所代表的科学）的历史发生的现象学研究的终极意义在哪里？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澄清超越论现象学的根本动机。对于超越论现象学而言，其最终动机是回溯一切认识和科学在主观性中的最终来源问题，并通过对科学和人类精神生活的现象学奠基而最终克服近代客观主义带来的科学和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而如前所述，包括几何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的认识活

^①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40页。

^{②③}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179、175页。

动和科学始终已经在人类历史视域中，因此我们对几何学的源初意义的历史回溯，是探寻使科学回归生活世界并澄明其对于我们人类精神生活的真正意义。

那么，对几何学的源初意义的回溯性追问如何可能呢？换句话说，这种历史性的回溯的超越论现象学依据是什么？以及这种追问如何进行呢？我们在下文中依次论述这两个问题。

首先，几何学的源初意义构成的先天条件保证了对它的回溯性追问的可能性。“只有在一切可想象的变更中所存在的由不变的时空形态领域所构成的绝然普遍的内容以观念化的方式得到考虑时，观念的构成物才能诞生，这种观念的构成物对人类所有未来的时代来说永远都是可以再次得到理解的，因此是可以传承的，并可以以其同一的交互主体性的意义被再造出来。这一条件远远超越了几何学，它对所有那些应该以无条件的普遍性的方式而具有可传承的精神构成物都有效”。^①

历史构成“任何作为历史事实——不管是作为当下的经验事实还是作为由历史学家所证实的过去的事实——都被确定的东西，都必然具有其内在的意义结构”，^②几何学作为历史性的连续构造的传统，当然也具有内在的本质意义结构。

其次，几何学这种意义构成的活动在人类文化的历史性视域中前后相继，连续不断，形成了一种意义传递的传统。几何学的发展“涉及到一种连续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所有获得物的效力继续存在，它们全体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了一个总体性”，^③每一个阶段的总体获得物，在下一个阶段而言是一个总体的前提。事实上，如同整个人类历史，几何学的历史“从一开始就不过是源初的意义构成(Sinnbildung)和意义沉淀之间的相互交织蕴涵的(des Miteinander und Ineinander)活生生的运动”。^④

可是，这种意义往往隐藏在历史事实之中，并不能为事实性的历史学研究所揭示，因为它是从朴素的历史事实出发，以朴素的方式得出结论的。

再次，“不管这种意义怎样地隐蔽，不管我们对这一意义的‘共同意指’如何具有纯粹的‘蕴涵性’，它仍然包含着说明、‘解释’和澄清的明见的可能性。”^⑤这种意义具有其超越时间的本质明见性，并可以为我们的回溯性追问所激活和唤醒。我们对几何学的源初意义构成的回溯性追问，正是一种对其意义的澄清。

最后，我们回溯地追问几何学构成物的意义的切入点在哪里？答案是从当代的几何学传统切入这种历史的追问。因为我们当下处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视域中，我们不可能超越几何学的这种传统而直接追问几何学的源初意义。

那么这种从当下开始的回溯何以可能呢？这是因为，“被理解为总体性的当下文化之整体‘蕴涵着’处于不确定的普遍性之中但在结构上又处于确定性的普遍性之中的过去文化之整体。更准确地说，这个当下文化之整体蕴涵着彼此相互暗含的连续性过去，每一个过去本身都构造着一个过去了的文化的当下。”^⑥因此，通过从这个传统的当下切入，“就可能回溯地追问几何学被湮灭的源初开端，就像这些开端作为‘原创’活动而曾经必然是的那样。”^⑦

(二) 几何学的意义构成和传递的途径

当几何学家们立足于生活世界中的测量实践而建立几何学之时，同时也是在历史性的生活视域中，源初的意义不断地构成、沉积、再构成的连续不断的活动。

“作为预备阶段，在此之前必然存在一个最源初的意义构成(Sinnbildung)，而且无疑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第一次出现在成功实现的明见性中”。^⑧

对于几何学的由筹划而实现的源初意义的构成，对于主体而言是当下地明见的。但是这种在实施构造行为的主体内获得的明见性如何克服其个体的主观性呢？如前所述，这种几何学的认识过程，贯穿着一种本质直观，因此几何学的对象是一种本质的观念性对象，因此它对所有现实的或可能的几何学家而言都是客观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205、198、178、197、196、196~197、176、178页。

存在的。

在胡塞尔看来,观念的“这种客观性为文化世界整个类别的精神产物所固有,属于这类精神产物的不仅有科学的构成物以及科学本身,而且也包括例如文学作品这种构成物”。^①然而,例如文学等文化形式如何具有一种观念的客观性?胡塞尔并没有对这样困难的问题给出具体的阐释或论证。

要使个体在意识中构成的观念对象超出个体的精神领域而具有主体间的客观性,就必须有一门普遍语言,它可以单义地表述观念性的对象,使之成为主体间可以没有歧义的传递。语言对观念对象的表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人、世界和语言三者的关系中,人和人所能够谈论的世界为一方,语言为另一方,“这两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而且人们总已确信它们的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的同一性,尽管这种确信通常只是隐性的并处于视域之中”。对于语言表述的接受者而言,对观念对象的接受首先是一种被动形式,而后在主动的理解中,观念对象会像回忆中那样实现源初的激活。通过语言而实现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的联系中,每个主体的源初创建物能够为对方所再理解,从而实现两者间的交互主体性的同一性的明见性意识。明见性通过这种重复的活动进入他人的意识,最终使个体的主体内的观念客观性成为语言共同体内部的同一性的明见性。

通过书写的语言表述,人类的共同体化跃上一个新的阶段。书写语言能够超越主体间的语言交流而通过语言符号实现明见的意义在历史中的连续的传递。这样,通过书写符号,几何学构成物的表述方式发生了转换。与此相应,这种构成物的明见性也发生了转化。通过阅读历史文献,后人就能够唤醒这些几何学构成物的意义。在这种阅读中,首先是被动地接受这些文字所表述的几何学构成物;接着,通过理解而回溯地转变成相应的主动性,从而使得这种构成物的意义能够不断地被激活。

(三) 对几何学的源初意义的追问方式

如前所述,由于几何学的历史是一个在历史的视域中连续不断地进行的意义的构成、沉

淀、整合、再构成的连续的传统,而且当下的传承蕴涵着过去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种传承物(定理、命题)开始,沿着这种意义的链条回溯到几何学的源初意义的构成的起点,最终追溯到它们在生活世界中的源初意义构成。

当然,“这些回溯的追问所坚持的不可避免的是一般之物,……这是一些可以作出各种解释的一般之物,随着这些解释,这样一些可能性得到了预先确定;抵达的问题和作为回答的明见性规定”。^②这个过程是从一般性的解释向差异性的解释的不断过渡。

那么,几何学的源初的意义构成的起点在哪里呢?“由于这样一种存在的意义,这种科学,尤其是几何学,必然曾经有过一个历史的开端,而且这种意义本身必然曾有过在创建行为中的起源:首先是作为筹划,然后是在成功的事实之中。”^③

但这里的“第一次”并不是要在几何学史上寻找一个事实性的历史起点,它对于意义起源的寻求而言,完全是不必要的虚构。因为按照超越论现象学的观点,包括几何学在内的一切科学都是奠基于生活世界的主观性的成就,它们的源初意义来源于生活世界。因此,所谓“第一次”只能理解为几何学意义的意向性构造的第一个阶段,或者说是意向构成的先验逻辑起点。

可是,我们知道,几何学起源于前科学的人类社会中的测量实践,这是一种经验性的历史实践。那么这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种从事实性的历史事件到源初性的、超时间的意义构成的跳跃是如何可能的呢?德里达因此而抱怨说:“在达到这一点之后,胡塞尔进行了一种看起来令人困惑的迂回。他没有描述含义在其本身之中以及在其‘第一次性’(Erstmaligkeit)中的原始生成”。^④其次,这种以筹划为基础的意义构成行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事件,还是具有历史的内在

①②③④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179、176、178、51页。

的必然性呢？最后，如果这种历史发生是具有内在必然性的，那么几何学的历史发生和连续不断的发展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的产物？对于这几个问题，胡塞尔并没有具体地展开论述，我们可以根据其现象学的基本论述作如下回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按照书中《经验与判断》，本质性的经验的构成，起源于前谓词的到谓词直观经验的构成，实现于自由想象的变更这种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几何学和其它认识一样，源于生活世界中的主观性构成的成就。从土地测量实践到几何学意义的构成，对应于直观的生活世界中从谓词经验构造到普遍性命题的构造这两个阶段。几何学的最源初的意义构成，是几何学家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形态和空间的本质直观的结果。

关于第二个问题，按照书中《经验与判断》，从前谓词的经验到本质科学的普遍性经验的构造过程，是超越论的逻辑发生构成的内在的目的，也是人类理性的内在趋向。因此，从人类理性发展的内在趋向而言，几何学的产生是这种内在目的的实现，具有内在必然性的一面；而就几何学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性事实而言，它是偶然的历史事件。

如果说几何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种历史的内在目的论的意义，那么这种历史目的论的来源不是某种神秘的自在之物或者绝对精神，而是我们的理性本身的内在目的。它有不断地自我发展和实现的必然趋向，这是一种理性自身的先验逻辑。

具体的历史回溯的出发点，就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几何学的公理和命题。“而从这些公理出发，我们便可抵达是基本概念成为可能的源初的明见性”。^① 由于几何学的理念化，尤其是近代以来整个数学的抽象化，使得几何学的源初意义构成的本真历史被掩盖。虽然，由于几何学逐渐理念化而掩盖了它在生活世界中的本真的意义起源，“在像这样当下地立身于我们面前的概念和命题本身中，它们的意义首先并不是表现为明见的意指，而是表现为带有被意指的但尚未被遮蔽的真理的真命题”，^② 但

是，借助于现象学的历史追问，“对于这种真理，我们当然能够通过（这些概念和命题）本身（的运用）并将其置身于明见性之中的方式而把它揭示出来”。^③

三、把对几何学的历史发生学研究拓展到人类历史的历史现象学研究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胡塞尔把对几何学的历史发生学研究看作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研究的一个例证，因此可以从对几何学的特殊研究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因此，“这些带有我们所赋予的特殊样式的问题立即就会引起与人类和文化世界相关的存在方式的普遍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的先天结构的总体问题。”^④

（一）对普遍历史或历史一般的现象学探究如何可能？

当胡塞尔试图以对几何学意义起源问题的追问为“例证”，通过现象学的方法追问人类历史的先天结构之时，无疑是令人疑惑的。因为，不同于几何学的对象都是观念性的构成物，人类文化是活生生的、事实性的历史发生。如何能够以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去把握这种事实性的存在的历史呢？

这是因为，对胡塞尔来说，事实性的历史总是已经以一种本真性的历史为其根据，“即不论每一种类型的全部的事实性是什么，不论为了证明反对意见而提出的这种类型的事实性是什么，它们在人类的普遍之物的本质成分中都有其根基，一种贯穿于所有历史性的目的论的理性恰恰表现在这里根基之中，这样便显示出与历史的总体性有关、并与最终赋予历史以其统一性的总体意义有关的独特的提问方式。”^⑤

在这里，历史不再能被理解成外在于人的意识的自在发生、自在存在的事实性的存在，而是人类在历史性的世界视域中的构成物。“历史从一开始就不过是源初的意义构成（Sinnhil-

①②③④⑤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195、195、195、195、206页。

dung)和意义沉淀之间的相互交织蕴涵的(des Miteinander und Ineinander)活生生的运动”,^①这种传出的意义构成形成了历史的先天结构或者历史一般。

任何对事实性历史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去探究作为事实性历史奠基于其上这种历史的先天结构,因此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历史。“只有揭示出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们全人类(从其总体性的普遍本质结构来看的全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历史实践,只有这样一种解释,才能使真正具有理解力和穿透性的历史学、使本真意义上的肯学的历史学成为可能。”^②

几何学研究的方法之所以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是“因为哲学以及特定学科的本质历史不是别的,而是把当下被给与的历史意义的构成物即它们的明见性——完全沿着历史记载的返回链条——一直回溯到对这些构成物进行奠基的原明见性的被遮蔽的维度”。^③胡塞尔相信,如果我们能把对几何学源初意义的追问进行系统实施,那么我们将获得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的普遍先天。^④

在胡塞尔看,对几何学源出意义的追问不仅是对人类历史先天普遍性追问的例证,而且对后者的追问是真正理解前者的本质根据。这是因为,几何学不是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是整个人类历史传统整体的一部分,它在这个历史整体为前提。因此,“在这一方面,这一特有的问题本身只有通过诉诸作为一切可想象的理解问题之普遍源泉的历史先天才能得到理解。在科学中,真正的历史说明的问题,与‘认识论的’论证和阐明的问题是——一致的”。^⑤

(二)对历史进行现象学探究的普遍方法论

对于包括几何学和整个科学的人类历史世界一般的揭示,需要我们从历史传统切入,借助于事实性的历史。那么,如何才能超越事实性历史材料而真正把握历史的先天结构呢?而且我们自身就处于历史性的世界视域中,我们如何超越于我们自己的当下?我们对历史的本质的探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具有理性的自由意志,“每一次当我们思义时,我们都明见

地发现自己具有一种能力,一种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反思的能力,一种对视域进行审查并根据揭示而深入其中的能力。”^⑥正是依据于这种理性的能力,我们才能摆脱我们的自然态度下的直向目光,而以反思的目光穿越事实性历史而去把握普遍历史的先天本质。

具体而言,这种理性反思的能力体现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中。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是现象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本质直观,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对象的意义和本质观念。在《起源》中,胡塞尔揭示出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不仅可用于对意识的静态结构、动态构成的研究,而且可以扩展到对历史现象的研究。通过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现象学对历史发生的认识论研究才真正得以可能。在这里,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是指“自由想象的变更”,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对这种方法有系统的论述。^⑦在研究历史的源初意义构成时,我们“通过思想和想象完全自由地对我们人类的历史存在以及在这里被解释为这种存在的生活世界的东西作出变更。恰恰在这种自由的变更行为中,在对生活世界的想象性的贯穿行为中,以一种绝然的明见性的方式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本质成分,这一成分实际地存在于所有的变项之中,就像我们以一种绝然确信的方式相信它一样。”^⑧

这里的“普遍的本质成分”并不是现象学的虚构,而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任何历史都是我们在历史性的世界视域中创建出来的,而这种源初的创建本身已经是以一种先天的本质结构为其基础。而这种先天的本质结构的根源不在于神秘的自在存在,而在于创建历史的主观性根源——先验自我意识生活——之中。

通过这种自由想象的变更,“我们便摆脱了与事实意义上的历史世界的一切关联,而将这

①②③④⑤⑥⑧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197、198、198、197、198、202、202页。

⑦ 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402页。

一世界本身看作是思想的诸种可能性之一。”^①也就是我们可以超越事实性的历史传统而把握历史的先天结构或者说内在的历史。

四、结论

由以上对胡塞尔关于几何学、科学和人类历史的源初意义构成的论证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首先，胡塞尔把历史发生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现象学的认识论。由于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文化总是已经在人类生活的历史视域中，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我们所在的历史性的、不断地构成着的生活世界中的主观性成就。我们要对科学和文化进行现象学的奠基，就必须深入到作为它们的意义起源和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之中，去揭示它们在生活世界的源初意义构成。因此，把现象学的研究由静态拓展到历史性的发生学研究，是实现现象学为科学和整个人类的精神生活奠基的必要前提。甚至可以说，现象学的发生学研究，并不仅仅是对以往现象学的非历史性的静态结构研究、逻辑研究的补充，而是一种更为彻底和根本的现象学研究的途径。

其次，我们要澄清科学在作为历史性视域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根源，我们就必须把对科

学的现象学奠基从先验逻辑拓展到作为认识论的发生学，对科学尤其是近代客观科学作历史发生学研究，系统地揭示它们在生活世界中的源初意义的历史构成。

最后，如果现象学的历史发生学得以系统地贯彻，那么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历史的先天结构予以整体性地把握，建立起一门历史现象学。但是，这种对历史一般或者内在历史的研究，并不能增加我们对事实性历史的知识，而是对这种历史的深层的说明和理解。所谓的历史的先天结构，并不能预先地决定我们将来的事实性历史的演进，而只是揭示了历史发生的逻辑可能性。而这种逻辑的可能性并不是一种神秘的自在的东西，而是来源于我们的先验的主观性，并在历史性的生活世界视域中被连续地构成。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2006 届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第 202 页。

How is the Phenomenological Genetic Study of History Possible?

——Husserl's Meditation on the Genesis of the Meaning of Geometry and Modern Physics

Zhang Changsheng

Abstract: Through inquiring the genesis of the meaning of geometry and modern physics, Husserl conducted a further medit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f human being's history. Taking the inquiry about the genesis of the meaning of geometry as an example, Husserl demonstrated that we could use phenomenological genetic method to study geometry as well as the whole history of human beings. By this way, science can really lay its foundation on our living world. It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making the phenomenology the basis of science and the entire humanity's spiritual life to expand phenomenological genetic study from its static state to historical and genetic research. It can even be said that the genetic research of phenomenology is not only a non-historical static structural research on the former phenomenology, or a supplement to the logical research, but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and basic path of phenome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Husserl; geometry; phenomenological genetic study